

国家“八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主编：夏之放 刘叔成 肖 鹰（执行）

当代审美文化书系

“家”的寓言

——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

李 军 著

作家出版社



I01
3
2

国家“八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主编：夏之放 刘叔成 肖 鹰（执行）

当代审美文化书系

“家”的寓言

——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

李 军 著

077922



定价 0005526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李军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
(当代审美文化书系)
ISBN 7-5063-1049-X

I. 家… II. 李… III. 文艺学:美学 N. I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3101 号

“ 家 ” 的 寓 言

作者:李 军

责任编辑:王 析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0 千字

印张:6.75

印数:0001—1000

版次: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5063—1051—1/I·1038

定价:11.25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书认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在理论方法上可以理解为一则“家”的解体和重构的寓言。根据中国文化的自身经验，本书提出了一种有关“家”的寓言的文化转型理论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问题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的结论。

作者简介

李军，1963年生，
哲学硕士。现为中央美
术学院史论系教师。曾
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目 录

导言：现代与后现代性	(1)
------------------	-----

上编 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寓言	(9)
I 第三世界与民族寓言	(9)
II 家国同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	(15)
III 士大夫的特殊意义：漂流的身份	(19)
IV 三家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结构	(21)
第二章 转型期的心理—文化理论	(31)
I 西方的心理—文化转型理论：经典俄狄浦斯情结 及其新近发展	(31)
II “家”的情结：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化	(43)
第三章 从家庭身份和性别角色出发的叙事理论	(55)
I 认同机制与能指——人与符号的基本二重性	(55)
II 身份与性别：文本内人物形象间的结构关系	(60)

Ⅲ	我、你、他：文本作为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形式	(67)
Ⅳ	寓居方式种种：作者与叙述者	(70)
Ⅴ	人际关系种种：叙述者与主人公	(74)
Ⅵ	“我中之你”与“你中之我”：主人公与理想的读者	(79)
Ⅶ	三类故事与三类阅读：真正的读者和文本	(83)

下编 分析与批评

第四章 当代文艺的开端：四部寓言文本的释读

I	《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寓言	(91)
Ⅱ	《家》：新文化运动的民族寓言	(95)
Ⅲ	《红灯记》：革命寓言	(100)
Ⅳ	《伤痕》：回归母性还是重返象征秩序？	(107)

第五章 父性的衰落：当代文艺中的男性形象（上）

I	父亲的形象史	(111)
Ⅱ	复归于婴儿：一部退缩的历史	(123)
Ⅲ	脆弱的男性	(125)
Ⅳ	逆子的回归	(135)

第六章 大地浪子：当代文艺中的男性形象（下）

I	历史语境	(144)
Ⅱ	人民之子	(150)

Ⅲ	神性的骄子·····	(152)
Ⅳ	两类女性形象·····	(159)
Ⅴ	真正的人是X ·····	(164)
第七章 母性·长女·幼女：当代文艺中的女性形象		
	·····	(172)
I	样板戏中的三类女性形象·····	(172)
Ⅱ	母性的牺牲与救赎·····	(175)
Ⅲ	负重的长女·····	(180)
Ⅳ	逃离的幼女·····	(189)
余论：“新状态”与女性时间 ·····		(203)
I	“新状态”与“女性文学” ·····	(203)
Ⅱ	女性时间：对当代性的再界定·····	(208)
后 记 ·····		(211)

导言：现代与后现代性

严格意义上说，当代的当代性是由“当代”话语的发出者，即话语主体的生命和生活加以测量并得到规定的。“当代”是“当下生活着的这一代”人的时间意识。因此，具有不同年龄和彼此迥异生活经历的人们，由于他们据以测量“当代”的参照系的差异，他们的“当代”是不尽相同的。举例而言，对一位如季羨林那样的世纪老人，他的“当代”即用他的“心镜”映照出来的从五四到今天的整个 20 世纪^①。对于张承志这一年年龄阶段的作家而言，他的“当代”只能是他所见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在目前正在就读的中学生那里，他们的“当代”则仅仅呈现为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时代。最后，在新生的婴儿那里，他们的“当代”可以用分秒计算。

对 1978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当代性的阐释将遭遇一套源自西方历史的叙事代码，作为理解自身状态的参照语境，那就是关于“现代”和

^① 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载《东方》1994 年，第 4、5 期。

“后现代性”的话语。一个新近流行的神话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终结，一个“后现代”社会正在到来^①。

其基本内容可概括如下：首先是时间上的分期。论者一般将自 1978 年以来的“新时期”分成两部分：从 1978 年至 80 年代末的“新时期”，从 90 年代至今的“后新时期”。其次是对这一分期文化意义的阐述。论者以为，“新时期”因其知识分子对启蒙和代言价值的执著而具有“现代性”特色；而这一“现代性”特色又可以在更大的意义上被纳入在贯穿本世纪中国人的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化焦点——“现代性工程”视域内予以观照^②。所谓“现代性工程”，是指“中国古典性文化解体以后，以西方话语规范为参照系，而重建中心文化的启蒙与救亡交织的话语实践”^③（另一种说法是，“对于中国语境而言，‘现代性’意味着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的‘启蒙’与‘救亡’的过程”^④）。随着“现代性”话语的发出和承载者的知识分子经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期，从文化话语中心被贬斥到边缘之时，这一“现代性”工程即告终结。随后到来的是所谓的“后新时期”。

“后新时期”文化被论者放置在对“新时期”文化之“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基础之上^⑤。这一反思与批判从两方面展开：

① 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陈晓明：《中国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

② 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2—34 页。

③ 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3 页。

④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载《战略与管理》，1993 年第 3 期，第 105 页。

⑤ 以下的论述都根据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载《战略与管理》1993 年第 3 期。

第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繁荣不是按照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文化设计，而是以所谓的“实用的精神”建构起来的，具有非彻底性、非规范性的特征。而大众文化及消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也使得知识分子及其文化退据边缘，使当前文化具有“后现代性”。

第二，西方世界关于“后现代”、“后殖民”新知识的出现，已使“现代性”思想成为过去。它遭到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思想在时间上的挑战，也受到来自“后殖民”话语在空间上的挑战。“现代性”的神话已被“解构”。

显然，这两个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如果把近现（当）代的百年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那么我们不必费力就能发现，将传统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中国，或将中国历史汇合到世界历史之中，始终是一个不变的奋斗目标或叙事方向，无论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概莫能外。这就是传统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化”主题。它从一开始就出自一项主体的理性设计。至于我们“革命”与“改革”之差异，不在于目标的差异（同为现代化）而在于手段，这种手段的差异则基于对“理性”的不同理解。换句话说，“革命”文化依据的是价值理性，而“改革”文化则依据工具理性（所谓“实用理性”）。从西方现代化历史上看，也可清晰地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路线：英国式的“改革”路线；以及法国式的“革命”路线。事实上，英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早于法国式的道路，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定在年代上早于法国革命的英国改革具有所谓的“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没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了。

由此可以引发出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澄清：所谓“现代性”，

并非仅仅意味着为论者转引，而为哈贝马斯依据康德哲学和韦伯思想所建立的三项“主体性”原则——在与宗教和形而上学分离之后的人类精神活动，围绕着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的自律性重建和发展，它们是人类生活的理性基础。与这种“自我寻找基础”的现代性原则不同，“现代性”还有另一项原则，它即为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到的那种“自我肯定”的原则^①，其先知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代表英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所谓“自我肯定”，意为“不把希望寄托在超然的神和权威之上”，而是“寄放在民族的未来，寄放在后世子孙的连绵不绝上”^②，显然，这是一项渐进的、改革的原则。它正是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所遵循的理性原则，一项“现代的原则”^③。

其次，在论者那里，对一项所谓依据西方他者话语的“现代性”神话的“解构”，居然必须重新依赖于一些新的西方他者话语——关于“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神话的依次建立，这种论据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已使我们无法信任建立于其上的一切话语的理论价值。

“现代性”显然没有终结。无论是“革命”的价值理性原则抑或“改革”的工具（实用）理性原则，它们分别作为“现代性艺术”和“现代性工程”，将随着当代生活的展开而展开，随着它的未完成而不能完成。因而，所谓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后现代性”，必然是一个伪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不具备任

① 参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② 参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③ 参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何“后现代性”因素，而是说，事实上为许多论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后现代性”，仅仅是中国社会自身历史阶段性逻辑的表现，即它从一个极端路线支配下的非常态社会向一个改革开放的常态社会转化时所出现的现象。其结果将导致一个向日常生活原则和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复归的世俗社会的形成。这一转化过程为王朔小说中那样的调侃和颠覆风尚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攀比西方“后现代主义”，这一风尚将随着改革开放的世俗社会的全面形成而自行告终。这一时间精确地发生在1992年。事实上，当一向以“俗人”自居的王朔在1992年的文坛上所向披靡、大获全胜之际（这一年被称作“王朔年”），我们却从他的一份自述中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王朔，一个相当道德化的、真诚的王朔：

过去我是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曲，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变成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①。

当然，这是一个“幸运”的成功者的“忏悔录”和自我感受。它如同一个宣言标志着俗人王朔的彻底主流化，也意味着一种世俗生活的彻底合法化。并非纯属巧合，作为作家的王朔

① 《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在这一年消声匿迹，代之以一个文化“大腕”的王朔，他在幕后操纵着大众文化消费的走向，并轻松地赢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而这一切又是与1992年中国的一件大事同时发生的，不要忘记，正是在1992年，中国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国策，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百姓，“把经济搞上去”与“使劲挣钱”，成为90年代中国人的最新政治口号和最高的时尚。

对于这一新动向，中国后学的守望者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并把它精确地释读为“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以大众传媒支配的、多元化的话语构成的、富于实用精神的新的文化时代”。^①明眼人自然一眼看穿这一系列充塞“主导”、“支配”等决定论元话语的句子，与声称反对一切“元话语、元叙事”的“后现代主义”，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它表明，有一种危机正在形成：市场经济与商业价值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压倒和主宰一切的元话语。

以下所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思考和观察，以及分析与批评。它将同时构成关于中国的一次叙事——一则“家”的寓言。

^①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化：挑战与机遇》，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第112页。

上编 理论与方法

本书上编将首先探讨一种从整体上理解和剖析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理论模式，其次则是将其转化为一种艺术文本的分析方法。如果与本书下编相比，上编将具有浓重的理论色彩；正如古人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上编对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不仅将构成下编对转型期中国当代文艺的具体分析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本书的特殊风格所在：旨在建设一种拥有独立方法的理论批评。

第一章 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寓言

I 第三世界与民族寓言

美国文化批评家 F·杰姆逊在当代中国文化界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暧昧的。一方面，他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评价与分析，以及有关“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某些初步构想，俨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界极为风行的“后学”和“第三世界批评”所供奉的基本经典，一直享有朱砂御批式的被引用的特权；另一方面，由于其第一世界文化人的身份，他关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论述，又被他的身处第三世界边缘的弟子们视为第一世界刻意营造第三世界他者化的文化形象的一种举措，被视为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文化侵略的表征之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剥夺了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发言权，并使其理论成果尽入己囊。这恐怕是中国式的“西体中用”手法的一次